

諸葛亮評傳

唐 明 邦

暉暉若長庚 孤出照一方
勢欲起六龍 東回出扶桑^①

這是卓越的政治家王安石满怀激情贊美諸葛亮的詩句。

諸葛亮這位家喻戶曉的历史人物，是封建社會里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東漢末年、三國初年的法家代表。

諸葛亮在蜀國執政期間，貫徹、實踐法家路線，對東漢以來的腐朽的封建制度進行了某些改革，厲行法治，安定蜀國政局；推行耕戰政策，發展社會經濟，開發祖國西南部，為反對分裂，謀求國家的統一，奮鬥不懈，做出了歷史貢獻。

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把諸葛亮描繪成神話般的人物，說他足智多謀，神機妙算，是“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的“天才”。其實，諸葛亮是在反對豪族地主的分裂割據的鬥爭中湧現出來的庶族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有他自己戰鬥成長的歷史。

自比管樂，胸懷統一大計

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出身在東漢琅邪郡陽都縣（今山東省沂水縣）一個封建官僚家庭。父親諸葛珪曾任太山郡丞。父母早死，由叔父豫章太守諸葛玄撫養。公元194年，諸葛亮才十四歲，他的叔父丟了官，帶着他投靠荊州牧劉表。不久，叔父死去，他就寄居在襄陽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屬南陽郡鄧縣）。他在隆中住了十三年，那時沒有政治地位，曾經“躬耕壠畝”，同下層人民有过某些接觸。

諸葛亮的青少年時代，全國的政治形勢發生着劇烈的變化。東漢封建統治者一味推行尊儒反法路線。在朝廷里，宦官和外戚相互傾軋，輪番執政，竟相壟斷土地，敲骨吸髓地剝削農民，政治極端腐朽黑暗，階級矛盾不斷地激化，終於爆發了轰轰烈烈的黃巾農民大起義。起義軍在“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革命口號下，對腐朽的東漢王朝進行了致命的打擊。然而，各個豪強勢力在鎮壓黃巾農民起義軍後，互相撕殺，進行了長期的分裂混戰。華北地區呈現“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②的悲慘景象，人民痛苦不堪。戰爭的結果，董卓、袁術、袁紹、呂布等封建割據勢力，先後被消滅，黃河流域，除隴西外，基本上為大政治家曹操所控制。整個江南地區，則屬孫權統治的範圍。荊州和益州由軍閥勢力劉表和劉璋盤據着。總之，分裂割據的狀態，雖有所改變，國家依然沒有達到統一。消滅分裂割據，恢復祖

国的统一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政治家诸葛亮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把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

诸葛亮寄居的襄阳，当时是荆州的政治舆论中心和战略要地。驻军襄阳的荆州牧刘表是个“不习军事”的儒生，在那兵慌马乱的年头他还常在“呼鹰台”上玩老鹰，哼《野鹰来》曲^③，有点“招贤纳士”虚名，曾是东汉末年所谓“名士”中的“八俊”之一。因此，不少所谓“名士”，即著名的在野的封建官僚绅士，纷纷到这儿来“避难”。这批人，同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各方面情况，故能比较清醒地分析、估计形势，品评各流人物。诸葛亮有机会同这流人物广泛接触，间接地了解全国各地情况，增加了自己的知识。

诸葛亮交往最密切的是襄阳“名士”庞德公，即诸葛亮的姐夫的父亲。诸葛亮常去向他请教。这人对诸葛亮相当器重，称赞他为“卧龙”。

或许由于庞德公的介绍，诸葛亮结识了沔阳“名士”黄承彦。黄对诸葛亮更加赏识，以至把他收为女婿。

还有一个司马徽，被庞德公称为“水镜先生”，说他品评人才很透、很准。他对诸葛亮深表敬佩。第一个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就是他。

诸葛亮不但从这些“名士”那里了解到各派封建军阀势力盛衰、兴亡的情况，还同身边的一批好友如徐庶、崔州平、孟公威和号称“凤雏”的庞统（庞德公的侄儿）等，讨论时事，切磋学问，发展自己的思想。

诸葛亮年青时，阅读过各方面的书籍，对管仲、申不害、韩非等法家人物的著作特别喜欢。好学深思的诸葛亮常同师友纵谈天下形势，时而“抱膝长啸”，好为《梁甫吟》，自比为管仲、乐毅。管仲是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齐桓公的宰相，他厉行法治，实行耕战政策，使齐国最先强大起来。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大将，他统帅的部队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小小的燕国敢于对抗强大的齐国，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诸葛亮从小崇拜法家人物，阅读法家著作，吸取法家思想来分析天下形势，确立自己的政治抱负。

公元二〇七年，刘备接受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三顾茅庐”，访问诸葛亮，向他请教如何统一中国的大计，请他出来帮助自己建立政权。二十七岁的诸葛亮，抛弃儒家经典上的教条，不信“君权神授”的谬论，以法家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为指导，根据平日掌握的大量材料，从客观形势出发，回答了刘备提出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或《草庐对》）。

《隆中对》为刘备制定了一套由“三分天下”而逐步统一中国的战略策略。其要点有：曹操不信天命、靠人谋，以弱胜强，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暂时“不可与争锋”；孙权割据江东，政局稳定，统治基础深厚，可利用他同曹操的矛盾与之结成同盟，“而不可图也”；荆州和益州内部各有矛盾，善于利用其矛盾就可夺取为自己的根据地；搞好内政，与孙权结成同盟，再改进同边境兄弟民族的关系，是统一全国的重要条件；等到曹操统治地区发生变故，就发动钳形攻势，一路从荆州向北，一路从益州入陕南向东，两面夹攻，打败曹操，这样就能统一全国了。

诸葛亮的这一计谋，有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方面，坚持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同儒家鼓吹的唯心论的“天命论”针锋相对，《隆中对》首先指出：“名微众寡”的曹操，其所以能“以弱为强”，不在“天时”，乃在“人谋”。因此，诸葛亮在分析形势的时候，抛开儒家那套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从分析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入手，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

动作用，利用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为统一全国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大动荡、大分化的形势下，提出了统一中国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来确定战略策略。尽管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远远不具备，有一定程度的空想性，却同那些一心搞封建割据的军阀们的思想大有区别。统一还是分裂，这是当时儒法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的民族是爱好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政治家们只有适应人民的这种要求，才能有所作为，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贡献。

对诸葛亮的这一计谋，刘备十分钦佩。刘备这人，曾是大儒家卢植的学生，过去好讲仁义。他出身贫贱，小时曾同母亲织席、卖鞋为生。本质上是希望统一，反对分裂的，要求改变东汉末年的黑暗统治，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他同推车的关羽、杀猪的张飞等这些从下层人民中涌现出来的英勇善战的人物结合在一起，力图为革新社会作一番贡献。他先后同几支封建割据势力作对，不断遭到打击和失败，投靠过曹操，也未受到重用。由于没有得力的助手按照法家路线来帮助他组织斗争，奋斗了半辈子，还一事无成，连一块根据地也没有。听了诸葛亮这套战略策略分析，就马上拜他为军师，他说：“我有了诸葛亮的帮助，就好比鱼儿得水。”^④ 诸葛亮也乐于借助刘备的政治、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舌战群儒，实现联孙抗曹

刘备“三顾茅庐”后不久，曹操派兵夺取了襄阳。刘备带领诸葛亮和张飞等人向南撤退，力图去掌握刘表留存在江陵的大批军事物资，以便占据荆州作为一块根据地。曹军加紧追赶，刘备败走夏口。

在大军压境情况下，刘备接受诸葛亮建议，联合孙权，共同抗曹。出使江东的任务，由诸葛亮承担。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⑤。出使江东需要达到双重目的。把孙权争取过来，孤立曹操；说服孙权马上出兵，打破曹操南下的计划。

诸葛亮去江东之前，曹操早已向孙权挑战，外交辞令是：“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⑥。孙权手下一批儒生，平口里开口“子曰”，闭口“诗云”，显得满腹经纶；危急时刻，都只想如何保住自己的生命财产，走一条风险最小的途径。曹操大军南下的消息传来，“莫不响震失色”^⑦。以张昭为首的一批江东豪族地主的代理人，劝说孙权赶快向曹操投降。孙权早已看出，除鲁肃、周瑜等人外，张昭、秦松之辈，“各顾妻子，挟持私虑”^⑧，都不肯死心支持他，使他深为失望。这时，诸葛亮去到江东，同孙权手下这批儒生、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张昭，进行了一场大论战。诸葛亮利用了当时孙权同曹操各自代表的封建政治势力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指出孙权面前摆着抗曹和降曹两条路，如不当机立断，前途定然不妙。诸葛亮为了把孙权争取过来，首先向他表明刘备坚决抗曹的决心，驳倒张昭等主降派的议论。经过一场斗争，终于使孙权排除投降派的议论，下决心同刘备联合抗曹。诸葛亮取得第一步成功。但孙权手下的儒生们，被曹操其势汹汹的大军所吓倒，大多不同意马上出兵，散布一派失败论。诸葛亮进一步分析了曹军的弱点，驳斥那些“论安言定，动引圣人”的腐儒之见。指出：曹军多是“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对于曹操，“非心服也”，不会支持他；曹军南下，“远来疲弊”，“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⑨，锐气早已大损；后方太远，战线很长，兵士不服南方水土，且已流行疾病，是不会有很大战斗力的，这些都是曹军的不利因素。曹军名是八十万，实际战斗力只有二十几万人，只要孙刘联合，“协规

同力”，破曹军是有必胜把握的。种种投降论、失败论被诸葛亮驳倒，在周瑜、鲁肃等人支持下，孙权终于决定马上出兵三万，同刘备共同抗曹。诸葛亮出使江东的目的圆满实现。

接着，孙刘联军以五万之众，对抗曹军，凭着长江天险，巧妙地利用地理、气候上的有利条件，夺得了“火烧赤壁”的大胜利，迫使曹操退守襄阳以北。赤壁之战，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统一。由于统一全国的条件还远不具备，这场战争后，基本上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政治局面相对地稳定下来，南北的战争大大减少。

赤壁之战，对曹操来说，是一次大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曹操骄傲自满，乘胜追击，走得太远了，华北地区还有后顾之忧，蹈了“骄兵必败”的复辙。联孙抗曹，对刘备来说，是一次政治、军事上的大胜利。胜利的取得，证明了诸葛亮对当时孙、曹双方政治、军事情况的分析估计是比较正确的。他善于把书本上得来的军事知识同现实的战争结合起来，坚持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正确原则，尽管双方兵力悬殊，自己居于不利地位，仍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抓住对方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弱点，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成为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转败为胜的著名战例之一。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曾经用这一战例来说明“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道理。指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

联孙抗曹的胜利，进一步显示了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同时也大大扩充了他的实际战斗经验。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威望和影响从此大大提高。

厉行法制，扭转益州政局

荆州这块根据地还不十分稳定，刘备就按照诸葛亮的计划插手益州了。益州，诸葛亮称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人口只有九十万，而物产富饶，有天然关塞屏障，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盘据益州的封建军阀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近三十年，政治十分腐败。支持刘璋父子的东州地主集团同益州地方豪强势力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政局很不稳定。刘璋手下的主要官吏同他离心离德，在《隆中对》里，诸葛亮就指出，益州的局势是“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备和诸葛亮利用益州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未经严重战斗，就迫使刘璋投降，夺取了益州的政权。更艰巨的任务是治理益州，开拓西南边疆，造成“天下未治蜀先治”的政治局面，为统一全国创造条件。

诸葛亮辅助刘备、刘禅，统治益州和后来的蜀国二十多年。他按照法家路线进行种种社会政治改革，打击了益州豪强地主，革除了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的一些弊政，扭转了益州地区的混乱局面。

诸葛亮的重要政治措施是厉行法治。他继承法家“治乱国用重典”的思想，分析刘璋其所以软弱无力，关键在于“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①即刘璋的政策法令得不到贯彻执行，地方豪强势力飞扬跋扈，各自为政。诸葛亮同刘巴、李严等人共同制定了一套法律，名叫《蜀科》，下令公布，严格施行。诸葛亮遵循法家“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原则，②信赏必罚，赏罚分明。为了防止贪赃枉法，徇私作弊，凡当处刑

十棍以上的案件，他都要亲自审理。陈寿在《诸葛亮传》中称赞他厉行法治的精神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⑪。对于诸葛亮厉行法治的措施，益州地方豪族势力的代表法正曾经表示反对，他要求刘备和诸葛亮学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缓刑弛禁”。诸葛亮严厉地批评他，“君知其一，不知其二”^⑫。指出，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不同，法令的宽严也应不同。善于审势，才能执法。益州的现时情况是：“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必须“威之以法”，才能“上下有节”^⑬。诸葛亮十分强调执法严明对于巩固统治、打击豪强的作用。他认为：赏罚分明，公正无私，勇士才能好功而不惜冒死，恶棍才能畏罪而不敢犯法。诸葛亮反复强调执法必须公平。主张“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⑭。

在厉行法治的同时，诸葛亮很注意任用贤能。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他认为“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他贯彻这种求贤能于“众下”的精神，非常重视从具有实际本领的部下中去发现人才。姜维本是魏国降蜀的下级军官，年只二十七岁，诸葛亮发现他“思虑精密”，称他为“凉州上士”^⑮，加以重用，后来成为蜀国得力将领。

诸葛亮一面按法家路线处理政事，一面不断用法家思想帮助刘备，教育刘禅。刘备在“三顾茅庐”后，对诸葛亮十分信任和重用，临死把蜀国政权也交给诸葛亮，他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⑯。足见刘备是个法家。刘备死时，还嘱咐刘禅可读法家著作《商君书》，“益人意智”。还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⑰。根据这些情况，清代法家代表王夫之曾说过：“先主习于《申》、《韩》，而以教子，其操术也，与曹操同”^⑱。

诸葛亮厉行法治，使益州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的行为得以抑制，统治秩序相对地安定下来，造成一个发展生产的有利环境。刘备几次外出打仗，后方安定，足食足兵。

务农殖谷，贯彻耕战政策

公元219年，孙权派兵袭取江陵，关羽败亡，吴蜀关系发生破裂。221年，刘备称帝后，不听诸葛亮等人的劝告，执意出兵伐吴，为关羽复仇，以收复荆州四郡。次年，败于猇亭（今湖北宜都境长江北岸），死于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此后，蜀国政事由诸葛亮全权处理。开始了诸葛亮治蜀的第二时期。

这时，诸葛亮所面临的形势是：魏国地区，由于曹操坚持法家路线，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改革，严禁豪强兼并，广泛实行屯田，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军事实力最为雄厚，已为统一全国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吴国孙权也奉行法家路线，积极推行“耕战”政策，使江南地区的生产有较大的发展，经济、军事力量都比蜀国强。蜀国地方最小，只及全中国的九分之一，连年来取汉中，伐东吴，人力、财力损耗很大。正如诸葛亮所说的，当时真是“民贫国虚”。要以此为基础统一中国，实在困难重重。

诸葛亮独立施政的第一步，是贯彻法家的耕战政策，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⑲。

首先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川西平原上有个重要水利工程——都江堰。诸葛亮对它一贯重视，设置堰官，专门管理。即使北伐时，“以此堰农本，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②0}。整个川西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②1}。尽管益州地区荒地较少，屯田的条件不如魏吴，但诸葛亮对屯田也很重视，曾募五千人到汉中屯田，以吕乂（读艾）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应军粮”^{②2}。这些措施对农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诸葛亮十分注意抑制豪强兼并土地，防止贪官污吏对农民敲诈勒索。他说：“克食于民，而民有饥乏之度，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②3}。诸葛亮鼓励农业生产的结果，几年内，天府之国呈现“田畴辟，仓廩实，器械利，蓄积饶”^{②4}的一派繁荣景象。

诸葛亮为了发展经济，还十分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当时蜀国有两种手工业产品是全国驰名的，一是蜀锦，二是井盐。汉代蜀郡织锦业的发达，居全国第一。诸葛亮更把蜀锦的生产提到支持战争的首要地位。他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②5}。蜀锦大量生产，盛销于西南，并远销吴、魏，成为蜀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当时，成都纺织业发展的盛况，左思《蜀都赋》有过生动的描写：“阡陌之里，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井盐，早在西汉就是巴蜀著名产品。汉武帝时，设有盐官专管。刘备定益州，曾“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②6}。诸葛亮任益州牧时，令王连为司盐校尉，专督盐业生产。还推广了“火井”（即天然气）煮盐的新技术。煮盐一项，每年“利入甚多”^{②7}，是支持战争的又一大宗收入。

刘备死后数年，耕战政策得到贯彻，生产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法家一贯重视发展生产。无论管仲相齐，还是商鞅变法，都积极推行耕战政策。儒家往往是农业生产的破坏者，孔老二讲“去食存信”，君子谋道不谋食；孟轲叫嚣“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口头上他们讲“正其谊不谋其利”，其实儒家都是残酷剥削人民的吸血鬼，兼并土地，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诸葛亮力矫东汉以来豪强垄断土地，破坏生产的种种弊害，大力发展生产，“务农殖谷”。“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在此基础上，诸葛亮才敢于“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②8}。

南征北伐，力争统一全国

诸葛亮的最终目标是按照法家路线恢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结束三国鼎立局面，巩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尽管当时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在蜀国还很不具备，诸葛亮却认为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尽力去实现它，因此有勉强的北伐。

北伐之前，为解决后顾之忧，先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恢复与东吴联盟，二是南征。

吴蜀联盟破裂后，魏国的威胁加重了，对两国都不利。诸葛亮为了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的敌人，刘备死后，便派人与东吴言和。这项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吴蜀联盟很快就恢复了。尽管这种联盟是貌合神离的，却为北伐解除了一重顾虑。

南征的由来是这样：刘备死后不久，蜀国南部的南中郡少数民族中的奴隶主贵族首领发动叛乱。这是长期以来民族矛盾发展的结果。东汉时期，封建统治者按照儒家思想，对兄弟民族实行“尊王攘夷”的反动政策，残酷地屠杀边境兄弟民族，使民族矛盾不断激化，边境

兄弟民族对东汉封建政府的反叛行为经常发生。诸葛亮早在《隆中对》里，就提出了新的方针：“西和诸戎，南抚彝越”。从这种“和抚”方针出发，南中郡叛乱发生后，诸葛亮没有急于兴师征伐。这次南征，诸葛亮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⑧的建议，实行“攻心”战术以“服其心”^⑨。诸葛亮亲自指挥三路大军南征，只惩办了高定、朱褒等少数发动叛乱的头目，没有采取大规模屠杀的政策。特别对于叛变的彝族首领孟获，七次活捉，七次宽大释放，使他终于诚心投降说：“南人不复反矣”^⑩。所以后人称赞诸葛亮：“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⑪。采用政策攻心，打击、孤立一小撮反动贵族头目，缓和民族矛盾，它符合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兄弟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历史记载，在诸葛亮“和抚”政策影响下，兄弟民族劳动人民“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⑫，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发展经济、文化。可见，诸葛亮对开发我国西南地区，加强民族团结，有一定贡献。

结好东吴，和抚南彝之后，诸葛亮全力组织北伐。他以法治军，建立了一支精锐的部队。同东汉末年封建军阀的部队相比，这支部队的显著特点是：军纪严明，战斗力强。诸葛亮认为，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不在人数多少，在军律是否严明。他颁布了种种军令，坚决执行。后人称赞诸葛亮治军“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⑬。诸葛亮强调兵不扰民。他说：“夫军武之器者，所以正不义，为民除害也”^⑭。他的部队在人民中有较好的印象。“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⑮。北伐时进军祁山，“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藁者不猎，如在国中”^⑯。后来，在陕西南部分兵“屯田”，“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⑰。以上这些都是封建史学家的记载，不无夸张之处，但也多少反映出一些可贵的特点。

公元225年，魏文帝曹丕死，次年，明帝曹睿继位，缺乏统治经验，内部有些动荡。诸葛亮考虑到蜀国“南方已定，兵甲已足”，正好利用这一时机，出师伐魏，“北定中原”。对于北伐的胜利，诸葛亮起初怀有一定的信心，并不如后人杜撰的所谓《后出师表》那样无把握，一派悲观论调。可是，没有料到发生了一些事件，大大增加了不利因素，影响了战争的进程。

第一是马谡的街亭失守。北伐前，不少人以为诸葛亮会令某些宿将为先锋。出乎意料，他大胆地任用年轻将领马谡。马谡是战将马良之弟，与诸葛亮亲如兄弟。此人善于论兵，却缺少实战经验。刘备曾经向诸葛亮说过：“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⑱。诸葛亮不以为然，引为参军，常同他讨论军事问题，采纳过他的一些好的意见。这次，马谡上前线，与魏军战于街亭，自以为是，违反了诸葛亮的命令，打了一个大败仗，对整个北伐战局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违令当斩，不少人要求从宽处理，诸葛亮为了严肃军纪，终于挥泪斩之。这说明他执行“诛罚不避亲戚”的原则是十分严肃的。同时，他上疏责己，把自己的官职贬低三级。

第二是李严的破坏活动。李严本是刘璋旧部，投降刘备后，累战有功，极受重用。刘备临死，让他同诸葛亮共辅刘禅。可是，他在刘备死后，“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⑲，享乐腐化，争权夺利。北伐时，诸葛亮令他驻汉中，把汉中建成一个可攻可守的基地，他“穷难纵横”，不肯上前线。反乘机要挟诸葛亮委他为巴州刺史。诸葛亮“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即李严）之短，莫若褒之”^⑳，顾全大局，仍委以督运军粮的重任。那时，把大量军粮、武器由蜀国运往现在的甘肃、陕西一带，交通极为不便，任务十分艰巨。为了改进运输，诸葛亮曾设计制造了木牛和流马。流马是“肋长三尺五寸”，“形制如象”的一种独轮

车；木牛是“方腹曲头，一脚（即车轮）四足（即车柱）”的人拉车，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④。用木牛、流马运粮，是一个技术创造，为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了通过漫长的峡谷和栈道，把军粮运上前线，诸葛亮还特别把诸将子弟都派到运输线上去，连自己的养子诸葛乔也不例外，足见他对这项任务十分重视。可是，对于这项重要任务，李严不但不认真执行，反而从中破坏。228年，兵围陈仓，曾因粮尽而退兵。231年，兵围祁山，军粮运不去，李严派专人去通知诸葛亮，要求他退兵。等到兵退之后，李严一面向刘禅诬报军情，说退兵是为了诱敌，以掩盖自己督运军粮失职的真象；一面又煽动军心，说什么“军粮饶足，何以便归？”^⑤制造谣言，嫁祸于诸葛亮，以损害他的威信。这时，诸葛亮才改变过去对李严的宽容态度，而揭露其“情狭志狂，若无天地”^⑥的狂妄野心，和“横造无端”，“迷罔上下”^⑦的两面派行为，予以严惩，废为平民。但对北伐，已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针对这两件事，清代著名法家王夫之曾经为诸葛亮惋惜道：“武侯之任人，一失于马谡，再失于李严，诚哉知人之难也”^⑧。总的来说，诸葛亮在任人、行法方面是谨慎的，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确定宽严分寸，具有一定领导艺术。难怪后人为吸取诸葛亮治蜀的经验教训，指出“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诸葛亮誓师北伐，目的在争取全国的统一。虽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准备，蜀军毕竟是以弱敌强，以劳对逸，以远图近，以被动对主动，战术上十分不利；而善于保持战争主动权的司马懿，利用了蜀军的弱点，采取持久战术，坚决不与之进行主力决战，因此，魏蜀战争相持达八年之久，诸葛亮“六出祁山”（实际上只两次到祁山）对抗大国，虽有小胜，难定大局，统一的愿望没有实现，就死于五丈原（今陕西省眉县）。唐代诗人杜甫悼念诸葛亮写下了著名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⑨。

鞠躬尽瘁，功在革新社会

诸葛亮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力图恢复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统一的愿望虽未实现，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仍值得肯定。在东汉末年国家分裂的局面下，诸葛亮顺应历史前进的要求，制定统一中国的计划；并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贯彻法家路线，进行社会改革，取得了重要成就。列宁教导我们：“历史功绩，不是以历史活动家较之现代的要求还没有作什么来判断的，而是以他们较其先驱者作了什么新事情来判断的”。评价诸葛亮的历史进步作用，也应如此。

诸葛亮曾经利用某些封建正统思想的口号，来组织斗争，这是他反儒精神不彻底的表现。然而，他指导政治活动的基本思想则是法家思想。这一点，连封建正统思想维护者、宋代唯心主义理学家朱熹也看得很清楚，他曾经攻击诸葛亮，说他“所学不甚纯正”，乃“出于申、韩”^⑩。清代法家王夫之不但肯定诸葛亮和刘备的法家立场，而且高度评价了诸葛亮在申、韩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历史成就：“军不治而唯公（指诸葛亮，下同）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而唯公足之”^⑪。人民要求改革社会，统一全国。诸葛亮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为之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诸葛亮死后，人民对他的历史功绩有所怀念，出现过“百姓巷祭，戎彝野祀”^⑫的现象，这决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诸葛亮毕竟不能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呢？唐代诗人温庭筠写得对：“下国卧龙空悟主，中原逐鹿不随人”^⑤。历史不是由个别人物的意志决定的。个别历史人物的主观努力，同他们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的关系，和毛主席所分析的战争指挥员同所处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一致的。毛主席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藉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论持久战》）。当时，诸葛亮同曹操都是力图统一中国的卓越政治家，诸葛亮治蜀，曹操治魏，都是有声有色的，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由于造成三国分立的社会政治势力不可能短期内消除，各个封建政治集团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分裂局面，不可能马上结束，促使恢复统一，结束分裂的政治、经济条件还不具备，所以，诸葛亮和曹操统一中国的愿望，在他们生前都不可能实现。可是诸葛亮和曹操推行的那条赖以统一中国的法家路线，却是留给他们的后继者的宝贵财富。他们那为之而奋斗一生的统一事业，也是令人鼓舞的高尚的事业。对东汉末年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来说，三国鼎立是走向全国统一的必要的历史阶段。为争取统一、反对分裂而斗争的诸葛亮，不愧是地主阶级的卓越政治家，他那种顺应历史发展而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守旧的思想 and 行为是十分可贵的。

当然，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位政治家，诸葛亮也受着不可超越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他只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在封建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某些社会革新，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而不可能改变封建制度本身。在当时的蜀国，庶族地主的力量比较薄弱，因此，诸葛亮在进行社会改革时所依靠的阶级基础不雄厚，使得他的一生活活动有着谨言慎行的特点，不但打仗不如曹操，社会革新过程中，也不像曹操那样具有大刀阔斧的气魄。

宋代以后，唯心主义理学家们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别有用心地歪曲诸侯亮的形象，说他仅仅是为一家一姓“鞠躬尽瘁”的“忠臣”。把他进行的种种社会革新，归结为一个目的：复兴那个“亲小人、远贤臣”而早已“倾颓”了的汉王朝，继续那个为诸葛亮所“叹息痛恨”的桓、灵绝世。今天，只有按照儒法斗争的历史真相，来评价诸葛亮的历史功绩，才能获得应有的历史借鉴。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访问武侯“书台”时，提出过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益有余；世上俗儒宁辨此：高堂当日读何书？”^⑩俗儒们当年不敢正视的问题，而今可以明确回答：诸葛亮所读的多是法家的书，实践的是法家的思想。这对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读一点法家著作，评法批儒，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启示。

注.

① 王安石：《诸葛武侯》诗。

② 曹操：《蒿里行》诗。

③ 《襄阳府志》卷五，《古迹·呼鹰台》。

④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⑤ 《出师表》。

⑥⑦⑧ 《资治通鉴》卷65，《汉纪》。建安十三年。

⑨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⑩ 《答法正书》。

⑪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⑫⑬ 《答法正书》。

- ⑭ 《出师表》。
- ⑮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 ⑯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 ⑰ 《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 ⑱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
- ⑲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 ⑳㉑ 《水经·江水注》。
- ㉒ 《三国志·蜀书·吕义传》。
- ㉓ 《便宜十六策·治人》。
- ㉔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
- ㉕ 《太平御览》卷815。
- ㉖ 《三国志·蜀书·吕义传》。
- ㉗ 《三国志·蜀书·王连传》。
- ㉘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默记》。
- ㉙㉚ 《三国志·蜀书·马谡传》。
- ㉛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 ㉜ 清代四川盐茶使赵藩题武侯祠对联。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 ㉝ 《诸葛亮集》附录：故事·遗事篇引《滇载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0页。）
- ㉞㉟㊱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
- ㊲ 《太平御览》卷526引《军令》。（又见《诸葛亮集》第38页）
- ㊳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 ㊴ 《三国志·蜀书·马谡传》。
- ㊵㊶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 ㊷ 杜佑：《通典》。
- ㊸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 ㊹㊺ 《公文上尚书》（中华书局版《诸葛亮集》第10页）。
- ㊻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
- ㊼ 杜甫：《蜀相》。
- ㊽ 朱熹：《朱子语类》。
- ㊾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
- ㊿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
- ① 温庭筠：《经五丈原》。
- ② 陆游：《游诸葛武侯书台》。